

PULSASIR 波先生

# 论阿甘本

[英] 艾利克斯·穆雷 著  
王立秋 译 / 芬雷 校

ALEX MURRAY

AMBEN





PULSASIR 芬雷先生

Email: fenree@gmail.com

---

## 论阿甘本

[英] 艾利克斯·穆雷 著

王立秋 译 / 芬雷 校

书籍设计 | 左旋

监 制 | 符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导论 为什么是阿甘本？

对吉奥乔·阿甘本来说，我们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古典政治观念不断削弱，景观的通俗文化大行其道以及是我们所是的“人”的权利持续遭受侵蚀的世界。然而阿甘本的批判绝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犬儒式批判，它也不缺乏历史的深度。事实上阿甘本的思想正是以它在我们的同时代，以及在它给予想象新世界的重要性上所提供的深度思考为特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是最好的批判，它拒绝接受我们还存有所谓“新的”问题，认为当下无以得到根本的改变，以及对同时代进行着激进而又公开的批判。

阿甘本作品的丰富性覆盖繁多，如当代欧陆哲学、诗学、大屠杀文献、圣经文本批评、电影研究、中世纪文献、法哲学（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语言哲学、对意大利及世界政治的评论，哲学史以及以断片形式

进行的思辨性批判写作等领域。然而，尽管他涉及的领域看起来庞杂得吓人，但是，本书要指出，阿甘本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机体，它浮现于一种对语言的关注；尤其对后者的理解，可能转变我们作为批判者与读者的实践。正如我提议的那样，他的思想铁定是属于当代的。无论阿甘本讨论的是什麼，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诗学或当代的景观社会，他的作品总在力图为某个既当下在场，却又可能尚未实现的“将来的共同体”，钝化（deactivate，使失效，去活化）其权力的装置。

许多人都会通过围绕牲人（homo sacer）（牺牲的 / 神圣的人）和生命政治学的描绘——这在一些评注者那里引起了喧闹的攻击——进入阿甘本的思想。阿甘本作品的这一面，主要关注西方法律和政治体系的本质，并指出控制和支配仍然是其核心。对近来哲学（发展）的最激进的贡献之一，在于他图绘他所谓西方法律和政治的“生命政治”功能的研究方法（这里怎么调比较通顺，）。尽管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章对此进行长篇的论述，但在这里我们还是想简略地指出，阿甘本追溯了古希腊政治观念中 zoē（生命）和 bios（有品质的生命）的分离，在政治领域对 zoē 的排除中辨识出政治与赤裸的或者说裸露的生命之间发生问题式关联的方式。阿甘本追溯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古希腊，再经由古希腊到罗马法，到英国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的观念，再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和当代难民的困境——政治范畴对赤裸生命的排除，以及所有生活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下的人民的脆弱；阿甘本指出，这个政治制度的主要功能，正在以政治化并控制生命

的诸众形式。在2001年10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爱国者法案》，抹除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法律地位的时候——在关塔那摩开设生命政治的三角禁闭营并引进一种永久的例外状态，在这种例外状态中，总统可以在任何他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悬置法律——，阿甘本指出，这些事件与西方政治和法律体系中一个内在的矛盾密切相关，并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先前的诸种“例外状态”，如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对法律的悬置。

这些观点常被人们带离原初的语境，但它们与阿甘本对语言的理解是一贯的，而它们也可以被读作权力在语言中的流动方式的表现。这种在语言中流动的权力的观念，引出了（与受其操纵和控制相反）人们何以能够使用语言的问题。阿甘本的回答与这样一种观念相关，即破坏权力的语言逻辑，并相反地，暴露语言的“发生 (taking place)”。任何“抵抗”的行动都不会在现存的制度之外出现，相反，“抵抗”的行动，恰恰在于当下的矛盾之中，而且，这里所说的抵抗，是一种涉及对当代语言地位——“其（当代语言的）过度增大 (hypertrophy) 和侵占 (expropriation) 定义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景观 - 民主社会的政治” (MwE: x 《无目的的手段》：第十章) ——的挑战的抵抗。因此，阿甘本并不主张一种为未来指定好的政治，相反，他强调当下政治“战略 (tactics)”的急切重要性。在一次访谈中，阿甘本引述了卡尔·马克思在给阿诺德·卢格 (Arnold Ruge) 信件中的一段话：“你不能说我对当下估计过高，如果我没有因当下而绝望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它绝望的情景使使我充满了希望。” (马克思，转引自《我是》 [“I

am”]:123n)。对阿甘本来说，正是通过一种对危机的理解，对内在于体系和结构中矛盾的理解，人们才能够理解如何把它们带向一种刺耳的中断。

在阿甘本思想中的一组复杂现象中，人们可以找到这个与再现和语言密切相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哲学思考阐明全异思想形式之间的关联与通道的能力之所在。阿甘本因此考虑到一种方法论的进路，这种进路，通过把握一种使内在于过去和当下的异质性元素相互关联的手段，从而能够在文化生产（电影，文学）和政治事件（“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方面引入新的理解。这种方法——本书不断探讨的也正是这种方法——能够提供一种用来批判过去和未来的若干方法的洞察力。

## 两个阿甘本？

因此，阿甘本的作品既是对当代的批判，却又是在严格地着眼于某个“将来的共通体”条件下所从事的批判。这两种元素——批判的探究和根本的开放性——近来已经在阿甘本的同时代人安东尼奥·内格里（1933—）那里得到了概括性的说明。一方面，阿甘本的思想以一种“否定的批判（negative critique）”为特征，这一特征，在内格里看来，界定了所有的战后思想。内格里指出，在欧陆传统中，所有的批判思想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



后——都试图摆脱总体化思想的辩证形式，这类形式在过去，则是许多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哲学体系的特征。在大屠杀以及驱策现代性发展的叙事之中信仰缺乏以后，这种拒斥是必需的。它力图解构导致权力和支配之滥用的思想体系和思想结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个对借助语言拆解这些支配形式的根本潜能，一种主动的抵抗模式——这种模式见证了把语言作为瓦解的关键进行分析的诸种形式——感兴趣的阿甘本。正如内格里陈述的那样，“事实上存在两个阿甘本。一个坚持某种本质的、命定的、恐怖的背景，他被迫与死亡的观念不断地对抗；另一个则通过对哲学劳动和语言分析的投入，抓住（添砖加瓦，演练并建造）生命政治的视野不放”（内格里，2003）。当我们努力在书中通过广泛的批判之努力来思考，力图揭露这两个不同的线索所蕴含的可能性的时候，这两半如何（合）在一起工作，以及他们在事实上是不是能够合二为一的两半，将一直是全书的前沿地带。在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进入阿甘本更有“生产力”的时刻之前，在第一章中，我首先要说明，阿甘本关于语言的著作，经由他与海德格爾的交战，表现为一种“否定的”基础的代表，而在后面的两章中，我将说明通过一种对辩证或二元（对立）观念本身的中断，他在这些更具“生产力”的时刻中引入了不作为（inoperativity），潜能和将来的共通体。这些，是为了给读者一种（阿甘本思想）“结构”的感觉，使他们能够把握阿甘本使用许多哲学进入点（entry point），也即，海德格爾与本雅明的作品，以接近一些我们将在剩下的几章中探讨的弥散区域（diffuse areas）（政治，文学，艺术和电影及

伦理)的方式。这里必须注意,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看起来可能都是这“两个阿甘本”的资源,前者是否定的,而后者,则是主动的。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我们绝不可说,内格里设置的这两个辩证的对立面是相互对立的。事实是,阿甘本的思想是在本雅明和海德格尔之间发展出来的,而不像人们相当可疑地暗示的那样,本雅明被发现是(对)海德格尔的否定和解药(参见德拉迪朗塔耶 [Deladurantaye] 2000:8)。海德格尔与本雅明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内格里的辩证分析暗示的结果。随着本书的深入,这点将变得清晰无疑,即这“两半”只是表象。与之相反,我们必须把阿甘本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在这个整体中,一切批判的时刻最终都必然与将来的共通体的根本潜能相关联。

## 语言的问题

为了把握阿甘本思想整个的统一体,有必要对其根本的前提进行探索。那就是,人类为其语言的“能力(faculty)”所定义,并且这种定义的活动一直在进行,而并非一劳永逸地一次性完成。人类拥有语言这个简单的事实,在阿甘本看来(他引述了像海德格尔那样的思想家,对后者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对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什么来说至关重要。然而,语言是什么?语言如何运作?如果人有语言,那么他如何经验它?我们与语言的关

系是什么？我们能拥有先于语言的经验么，如果有的话它能以通过语言之外的其他方式来表达么？语言与，比如说，影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许可以把阿甘本关于语言的思考分成相互关联又显著区分的三个部分：

1. 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存在有着本质的关联，因此也与哲学的客体 / 对象相关。这些哲学的关注与语言的“本质”以及它如何构成我们在世的存在等观念相关；

2. 语言受当权者的操纵，并因此而成为政治的客体 / 对象。本质上说，在语言 - 使用的形式 (forms of language-use) 之外不存在政治。这里，阿甘本对政府 / 智力与法律如何使用并操纵语言来创造并强化它们的力量，以及语言的使用何以可能成为挑战这种力量的手段进行了探索；

3. 语言是创造性表达的媒介，并因此而成为文学的客体 / 对象。语言在诗歌和散文中的使用和发展构成了一种对我们如何经验语言的重新接合 / 表达 (re-articulation)。

因此，本体论，政治和文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阿甘本著作的核心主题。

这个列表理应使我们对语言哲学外延渗入其他领域的不同方式有所觉察。这三个领域——哲学，政治 / 法律，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拆解这些领域之间传统的边界。可以认为，在阿甘本那里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朝向某种“诗学”的运动，是一种不

限于这些领域的既定限制，而相反超越思想的陷阱的思想形式。一个以“跨学科”研究，和日益增长的，传统知识领域之间边界的流动性为特征的智识环境中，阿甘本的著作无疑是那些努力把不同领域拉到一起之中最为有力的资源。

然而通过本书的探讨，这一点会显得尤为明显，即不同知识形式的连接 (joining) 对实用主义的学院式实践来说，很难说是有益的。因为把批判的实践引入那些它们通常来说在其中不占一席之地的学科，阿甘本受到了学界，尤其是那些以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人的严厉批评。比如说，在关于政治哲学的密集讨论中，阿甘本经常转向文学的文本以在辩论中形成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说，阿甘本能够使这种学科的跳跃“合法化”，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在语言哲学周围有着稳固的基础。比如说，他作出了——通过这个语言哲学中的基础——这样一些使弥散学科之间的边界模糊的陈述：“问题与其说在于诗学是否仰赖于政治，不如说在于政治是否仍然具有它原本具有的与诗学的凝聚力。”(IH:164《幼儿期与历史》:164)。但是，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观点在阿甘本的著作中有其功能性的地位，它用文学的形象和艺术的范例来干预形形色色的辩论，同时也以之来动摇那些给哲学可能是什么的流理解带上有色眼镜的批判的预设。这种实践已经引起了那些认为“政治”或“社会现实”不应放到与“文学”相同的平面上的批评家的愤怒（参见罗斯[Ross] 2008:11）。这种误解往往出自于阿甘本著作非正统的本质，他的著作并不以传统的“哲学”的方式（即与在世存在相关陈述的真理相关）展开。

但更重要的是，阿甘本的理论计划拒绝依附于某种学院的风气 (academism)：它是一个通过超越作为我们当代“智识”文化特征的期刊和专题论文来扩展批判思想之潜能的规划。

## 可再现 / 表征性 (Representability)

阿甘本作品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它经常遭受误读的那一部分，在于它对可再现 / 表征性的论述。一种观念，诸如“潜能”的本质，通过文本的结构，其“架构 (architecture)”，其再现 / 表征的方式，执行了一种特定的关于再现 / 表征的论证。这种再现 / 表征的形式被阿甘本定义为“批判”。“批判”实现的是什么？尽管这是一个复杂的观念，但它还是可以被简化为专注于这样一种通过某样再现 / 表征的形式来探索并执行其主题的写作风格。在哲学的一些形式可以通过诸如三段论或逻辑的命题来推进的地方，阿甘本的作品经常是循环的和断片化的。因此本书应该被当作一幅概念的地图来阅读，它将概述阿甘本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核心关注。但这些概念，必须被看作是在文本自身的呈现中被展开 (being played out) 的概念。

这种呈现的方法与阿甘本的阅读模式，从跨学科和媒介的领域中探索和挖掘文本，并在这些断片中发现一种与哲学形式相符合的过程。正如他陈述的那样，“哲学没有特性，没有专属的领域，

它内在于文学，内在于艺术或神学或无论什么，它正是这种包含某种有待发展的能力（capability to be developed）的元素。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散布在一切领域。它总是一种离散（diaspora），必须重新加以收集和聚集”（阿甘本：《什么是范式？》）。因此，阿甘本聚集多个思想家、艺术家和作家的多种线索，以创造一种哲学的“马赛克”。尽管这个马赛克的基础在于语言哲学，但它也能在一切地方找到它的“哲学”。而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将介绍许多关键的作家，阿甘本正是从这些作家那里网罗出自己的星丛：马丁·海德格尔（1899-1976），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米歇尔·福柯（1926-84），阿比·瓦尔堡（1866-1929）和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尽管这些作家全部加起来也无法穷尽阿甘本的思想资源，但这些关键的人物能够使读者对阿甘本本人如何阅读以及如何使用他人的著作有所了解。

哲学“散布”于一切领域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阿甘本著作的广大范围内，更在于“收集”和“集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作用在于动摇当下政治和社会控制的霸权形式。这个压迫的形式与当下暴力的系谱，不是着眼于对某个过去的“回归”，而是通过把它们特征回溯到一个原点从而使当下的结构不作为，它致力于通过追溯当下在过去中的阴影而钝化当下的“黑暗”。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早期的现代时期，无论是通过哲学的专题论文，政治的小册子还是诗歌的分析，它都是以阿甘本所谓“将来的共同体”的名义来完成的。实现这种将来的共同体是阿甘本的思想向我们提出的挑战，而这也是一个不容轻视的挑战。

## 第一章 语言与存在的否定性

如果关于阿甘本的著作，本书只做一个论断的话，那么，那就是语言哲学对阿甘本思想而言的核心性。如果我们要理解阿甘本理解诸如政治、伦理甚或电影此类领域的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他的思想看作出自于他对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怀有极大兴趣的结果。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阿甘本的一些核心文本，以达到理解他如何使用像语音，指示语(deixis)和本体论这样的核心范畴来概念化人，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看到，在把人设置为语言中的一个位置(site)的时候，以及通过在这种语言的能力上绑上存在之否定基础的时候，阿甘本生产了一种复杂却连贯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得以开始阅读他的作品，而在他的作品中，否定性的生

产与一种基于去活化或者说钝化 (deactivated) 的原初区分捆绑在一起。

## 阿甘本与海德格尔，一个起点

正如我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阿甘本与德国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阿甘本于 1966 年和 1968 参加了在普罗旺斯的勒托尔举行的，由海德格尔主持的专题研讨班，而他的著作《诗节：西方文化中的词与幻影》(Stanzas: Word and Phantasm in Western Culture) 就是为纪念海德格尔而作的。在这些私人的联系之外，阿甘本的作品反复地承载着海德格尔思想的轨迹。海德格尔的哲学围绕一种对存在本质的关注，一种被称作本体论的哲学传统而展开。其他哲学家可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如，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人类的幸福是什么？我们如何获得知识？这类问题在十九世纪期间支配着德国的哲学圈，但对海德格尔来说，它们都未能积极地思考思想的本质，而思想的本质，正在于存在的问题。存在标出了思想的观念，而存在，也正是哲学思考力图探索却鲜有把握的明晰而纯粹的条件。海德格尔把这种存在看作一种活动，由人类，或者说此在 (Dasein) 作出的一种活动，而此在本身，则试图阐明存在的观念：“我们将用此在这个术语来指称这种我们每个人自身所是的、把探究内涵为其存



在的可能性之一的实体” (1978: 27; 7)。

尽管海德格尔的著作给我们呈现了一套陌生的批判性语汇，我们还是能从他的思想中辨识出一些对阿甘本来说相当重要的要素。首先，海德格尔专注于思想与存在的基础。和海德格尔一样，阿甘本也是从哲学提出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出发的，而他的作品，则是沿着他本人提出这些问题的进程来展开的。其次，海德格尔看到，存在处于一种遮蔽 (concealment) 的状态，哲学则必须通过不断地对它自身的思想基础提出问题，来探索这种状态。阿甘本也把哲学看作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他本人的思想，也试图探索存在的遮蔽 (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通过语言问题来展开的。再次，在概念上，海德格尔把人定义为既对其自身必死性有所觉察，又对其语言的能力有所感悟的动物。这个根本的洞见对阿甘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并且，这个洞见本身就是阿甘本重要研究 《语言与死亡：否定性的场所》 (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的核心关注。第四，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一种“独白 (monologue)”：“它只和且独自和自己说话” (海德格尔 1993:397)。同时，语言除自身之外别无其他指涉 (语言只涉及自身)。正如他看似同语反复地陈述的那样，“语言就是——语言，言语。语言言语” (海德格尔 1971:191)。尽管语言言说的空间——语言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并通过这个空间来言说——是“人”的 (尽管“人”这个范畴在海德格尔那里意味着什么还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我们在对语言有所经验的同时又远离语言。这个矛盾——语言对自己言说且只言说自己，而这个言说又是通过人